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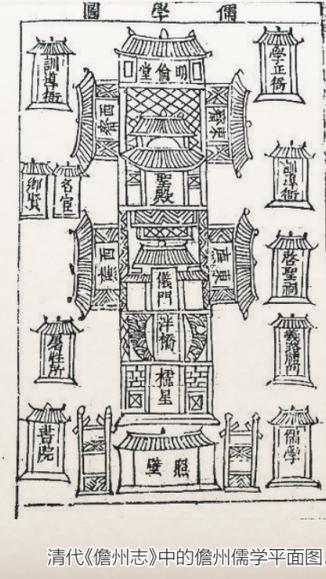
人物春秋

儋州历史悠久，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。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，全市共登记302处不可移动文物，其中古镇中和就有46处。

20世纪60年代初，郭沫若访问中和，曾在《儋耳行》一诗中感叹“儋耳古城古迹多”。从传世的文献，可以读到历代先贤为保护这些文化遗产，付出了艰辛的汗水。如南宋绍兴二十年(1150年)建宁军节度副使李光被安置昌化军，先后撰写《迁建儋州学记》《儋耳庙碑》；元延祐四年(1317年)，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、大都军行部范梈重建桃榔庵；元泰定四年(1327年)，南宁军判彭应雷重建载酒堂；元至大二年(1309年)，军判任大重建儒学明伦堂。此后，明代知州田章、罗杰、陈荣选、曾邦泰，古城守帅徐真、徐春增；清代知州张继邹、杨焜、李仲极、绅耆邢德、名流李文彬……他们都对保护儋州文物功不可没。

尤其是清代知州韩祐，为保护儋州文物作出重大贡献，值得大书特写。

韩祐，今北京大兴人。民国《儋县志·官师志》载：“韩祐，康熙三十九年知州。裁革谷仓积弊并衙用夫役，裁‘条鞭’收，户房书管收，革除编审朱墨银。四十三年，续修州志。四十六年离任。七年咸思之。祀州名宦。”韩祐在任七年，政绩斐然，县志把他列为“名宦”，实至名归。



清代《儋州志》中的儋州儒学平面图。

居儋旧录续新篇

韩国强

觅旧址，重建“古儋义学”

“古儋义学”为明万历十七年(1589年)琼山进士许子伟所建。许子伟幼失怙恃，流浪儋州，被兰村郭岐山夫妇抚养成才。许子伟考中进士后，为报答儋州人的养育之恩，回儋州建义学。

但是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到了清代康熙年间，学舍已倾圮。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，韩祐上任儋州知州后，立即寻访古儋义学旧址，看见牛羊出没，草树纷披，过去读书的场所，现在变成放牧的地方。他觉得身为儋州知州，看到这样的景象，应该把振兴学校作为急事。他在叹息之后，决定带头捐出俸银，选择吉日开工，拓土平基，购买材料，开始营建。

重建后的古儋义学，“堂分三进，其前为大门，旁列两室，中为讲堂，旁室倍之后。列文昌座，室如堂数。若由门至堂，由堂至后，左右旷地并留，盖厢房为肄业所自。”重建后的义学再现昔日的风采。

《儋州志》辑录的《义学记》一文，详细地记载了许子伟创建义学的经过及其意义。义学重建落成，州城绅士以功归韩祐，而韩祐却发出一番感慨：“莫为之前，虽善弗彰也，则肇基始创，端赖前人；莫为之后，虽美弗传也，则似续营修，仍须后起有人。以往史兹土者，喜维持，欣作育，时捐费而缮葺，岁出谷以迎师，务使义学常新，历久勿辍，则其功更大矣。”功成不必在我，其美德略见一斑。



《桃榔庵图》。刘运良作

道光八年(1828年)，古儋义学更名为“丽泽书院”。

清代琼山进士郑天章为讴歌先贤的功德，曾撰联：“丽景绕山川，肇启文风常仰许；泽人从学校，广增声价共瞻韩。”这不但是一副藏头联，也是藏尾联，藏头的“丽泽”比较容易看出，藏尾二字，不了解书院历史者，很难理解。上联尾字“许”，指的是许子伟；下联尾字“韩”，即指韩祐。

尊儒学，修复儋州学宫

学宫，即孔庙，俗称叫圣殿。据康熙《儋州志》记载，儋州学宫于北宋庆历四年(1044年)设立在城东；绍兴二十一年(1151年)，知军兼知州陈适迁到城东南隅；绍熙二年(1191年)，知军叶元璘又搬到城南。据史料记载，儋州学宫是海南最早的孔庙之一，其址历代几经迁徙，最终定于城南。

儋州学宫与其他名胜古迹一样，经不起风雨的摧残，时间久远逐渐崩塌。

清代顺治十八年(1661年)，儋州举人曾开撰《议修儋学疏序》倡议重修孔庙，与学正陈祝、训导欧阳霖协捐，孔庙得以修复。

康熙四十三年(1704年)，孔庙在风雨中受损坏。这距离曾开倡修复孔庙又过了43年。韩祐看在眼里，十分痛惜。作为一州之长，他动用公款修复祭祀圣人、教书育人的场所，一点也不过分，但他仍自掏腰包，捐俸修复。

康熙《儋州志》对此事记叙比较简略：“康熙四十三年，正殿东角并后檐及启圣祠，因风雨损坏，知州韩祐捐修。”然而，词简义深，韩祐的人品，及对儒学的尊重，是用实际行动来体现的。

离任前，重建桃榔庵

桃榔庵是苏东坡贬谪儋州的故居，于北宋元符元年(1098年)五月落成。东坡在《桃榔庵铭并叙》中，描写了当时的恶劣环境及其旷达的情怀。

元代延祐四年(1317年)，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、大都军行部范梈寻访桃榔庵旧址，一度重建桃榔庵，让桃榔庵重放异彩。

300多年后，桃榔庵又在风雨中坍塌了。

康熙四十五年(1706年)，知州韩祐目睹桃榔庵荒废，情如泉涌，其《重建桃榔庵记》云：“先生忠君爱国，儆言建白，其气节文章超越千古，独以忤时遭谤，万里投荒，栖息无地，不遑宁处，几为瘴疫所伐。”韩祐同情东坡遭遇，敬仰苏东坡，于是又捐俸重建桃榔庵。

重建桃榔庵即将竣工时，韩祐离任，但他放心不下，请代署州事的澄迈县令高魁标接着建设。于是，桃榔庵得以恢复昔日的风采。韩、高二君十分高兴，请时任琼州知府的贾棠撰写《重建桃榔庵记》，以记盛事。

《重建桃榔庵记》被刻在石碑上，迄今已是文物一件，碑文明记韩祐“引年乞休”。一个即将离任的官员仍心系重建东坡故居。这是一种什么精神？

桃榔庵已然不存，但是，这块碑记至今仍树立在桃榔庵遗址上。

韩祐在儋州执政七年，守护这片热土，热爱此邦风景，以诗章歌咏“儋州八景”。

他十分重视文物的保护及利用，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“为仰先生坚白志，居儋旧录续新篇。”(韩祐《儋州八景诗》之八《载海南戴》句)他在政务繁忙之际，仍全力以赴重修《儋州志》，留给后世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。

桃榔庵、孔庙等饱经韩祐情感的名胜古迹，已在历史的风雨中消逝了身影，只有丽泽书院还存留断垣残壁。

翻阅方志，一页页古老的信息仿佛将人拽回了历史的现场，让人不禁对韩祐这位“老市长”肃然起敬。



韩祐和高魁标重建桃榔庵后，琼州知府贾棠撰写的《重建桃榔庵记》碑刻。林发康摄

古人的“名片”

赵锐

现代人，尤其是商务人士，在交际中时常分发名片，古人也有类似名片的东西，只是在不同朝代，叫法不同而已。

在纸张普及之前，古人在木片上刻刻姓名，以拜谒和刺探对方意见，称之为谒、刺等。名谒较为郑重，多用于下级拜谒上级，材质为宽大的木板；名刺较为随意，多用于亲友和同僚之间，材质多为狭长的木简。纸张普及之后，古人开始用红纸或白纸书写姓名、官衔名等信息，有的以绳连结，也有单片使用的，被称为贴、状、纸等。直到清代，“名片”的称呼才正式出现。

古人在“名片”制作上颇为讲究。比如，有人为了凸显自己的高贵身份，或者攀附权贵，会选用名贵材质，有用大张金纸的，有用红绫的，有用织锦的，花样繁多，令人眼花缭乱。据记载，明代有个姓茅的官员，每次去拜谒严嵩，名帖都要选用红绫，再用赤金在上面绣字；张居正权势鼎盛时，一些谄媚之徒去拜谒他，呈上的名帖是织锦的，以大红绒为字，再用金线绣蟒龙装点，可谓奢靡至极。

久而久之，“名片”就成了拜谒权贵的“入场券”。只是，这样做也有风险，若有朝一日权贵倒台，那些送过华贵“名片”的人也势必

必受到牵连。为了规避政治风险，一些聪明人便给自己留了一手。

据《清稗类钞》记载，有位地方官迫于和坤权势，不得不制作高档名帖前去拜谒，但他并不在“纸”上做文章，而是以值钱的珍珠成字，这样，贪心的门卫就把珍珠都抠下来收入自己的腰包，名帖中的敏感字眼也随之被损毁了。和坤倒台后，许多给他送过名帖的人都受了牵连，唯独这位地方官安然无恙。

古人使用起“名片”来很严肃也很正式，一旦发出和接受，便意味着双方都不能随意取消会面，而且，一片一用，还要根据拜谒人和被拜谒人身份、地位、关系等的具体情况，随时改变“名片”的样式。官小的，要使用较大的“名片”，表示谦恭；官大的，要使用较小的“名片”，以示地位；若是呈给上司或长辈，为表尊敬，名字要尽可能写得大一些……

名片是我国古人的一项社交媒介，今天，随着制作成本的降低、电子名片的普及，名片分发的面越来越广，可收获朋友或者合作伙伴的成功率却并没有显著提高，甚至有时候还会因为反感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大概是因为与古人相比，我们使用起名片来，少了些郑重、严肃，缺了些真诚和针对性吧。

阿紫

唐昌玉蕊会 崇敬牡丹期

香味扑鼻。

看到旁边的木牌介绍：“玉蕊，分为玉蕊、红花玉蕊。是玉蕊科小乔木植物，穗状花序，顶生，螺旋状排列与枝顶状花序生于枝顶，长达70厘米以上。花茎5-8厘米，疏生于总花序轴上，往往一个花序轴上的许多朵花同时开放。玉蕊在中国海南常生长在海滨，有时和珊瑚植物混生在一起，因此有人称之为半红树植物，它还具有很强的耐盐性，在潮水经常浸没的地方也能正常生长。玉蕊喜土层深厚富含腐殖质的砂质土壤，但也具较高的耐旱和耐涝能力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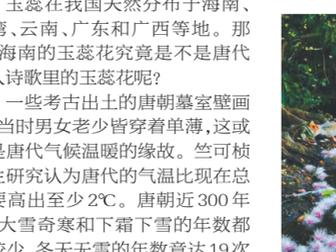
玉蕊在我国天然分布于海南、台湾、云南、广东和广西等地。那么，海南的玉蕊究竟是不是唐代诗人诗歌里的玉蕊花呢？

一些考古出土的唐朝墓室壁画中，当时男女老少皆穿着单薄，这或许是唐代气候温暖的缘故。竺可桢先生研究认为唐代的气温比现在总体要高出至少2℃。唐朝近300年间，大雪奇寒和下雪的年份都比较少，冬天无雪的年份竟达19次之多，居我国各朝代之冠，属于历史上的一个温暖期，气候相对比较湿润，加上不惜工本的培养，玉蕊是有可能在当时的长安城生存的。

玉蕊花有一个特点，晚间十二点以后开放，白天就纷纷凋落。粉白色的花朵在月光的映衬下，散发出特殊的香味，符合诗人写的“女冠夜觅香

来处，唯有阶前碎月明”；清代方文的《红棋盘豆》诗中“花似扬州玉蕊开，实似南海绉珠来”，说明了玉蕊的产地来自海南或广西一带。

南宋绍兴年间，庐陵周必大在《唐昌玉蕊辨证》中记：“玉蕊花苞初甚微，经月渐大，暮春方八出，如冰丝，上缀金粟，花心复有碧筒，状类胆瓶，其中别抽一英出外，散为十余蕊，犹刻玉然，花名玉药，乃在于此，群芳所未有也。”指出此前宋祁、黄庭坚等人错误认为玉蕊花为琼花、杨花属以讹传讹，原因大约是他们均未亲自种过玉蕊花。



儋州市中和镇七里村凋落水面的玉蕊花。张雨摄

学林一叶

汪曾祺与咸菜

成健

咸菜对于贫困时期百姓人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一百年前，走遍江苏里下河平原上的城镇乡村，包括汪曾祺的故乡高邮，哪家没有一两只咸菜缸或咸菜坛子，简直无法想象。

汪曾祺的祖母勤劳能干，尽管家境比较富裕，但每到冬天，腌咸菜这些事还是亲力亲为。一种是腌“大咸菜”，用一只能容得下五担水的大缸腌青菜。高邮一带原先没有大白菜，只有青菜，似油菜而大得多，高二尺，一年四季都有。第二种是腌芥菜。第三种是腌“辣菜”，那是将小白菜晾干水分，入芥末同腌，“过年时开坛，色如淡金，辣味冲鼻，极香美”。汪曾祺对祖母腌制的咸菜特别怀念，他说过，“自离家乡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咸菜”。

“入秋，腌菜，这时青菜正肥。把青菜成担的买来，洗净，晾干水气，下缸。一层菜，一层盐，码实，即成。随时随取，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。腌了四五天的新咸菜很好吃，不咸，细、嫩、脆、甜，难以比拟。”这是汪曾祺笔下腌咸菜的大致过程，他从小耳濡目染，记得明明白白。

在20世纪中叶往后的漫长岁月里，咸菜是艰苦生活坚硬的标志，是人们一天三餐无奈的依靠。大多数时候，咸菜从坛子里现抓现吃，偶尔也会抓一把加水烧汤，正如汪曾祺所描述的那样，暗绿色的咸菜汤咸中带酸，“没有吃惯的人，是不容易引起食欲的”。冬天大雪飘飘，人们怕出门，或者即使出门也没地方去买菜，只能吃咸菜。几时的汪曾祺为此心生抱怨：“一到下雪天，我们就喝咸菜汤，不知是什么道理。”

虽说咸菜不怎么值钱，但那时候穷人吃咸菜也会想着法子白吃。汪曾祺讲过一个笑话：北京的摊子上的咸菜是不算钱的。有个保定老乡坐下，掏出两个馒头，问“豆汁儿多少钱一碗”，卖豆汁儿的告诉他。又问“咸菜呢”，答“咸菜不要钱”。于是他修，“那给我来一碟咸菜”。

汪曾祺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条件其实是很不错的。除了下雪天喝咸菜汤，家里平日吃咸菜，一般都会有其它食材搭配。水乡野鸭多，其肉质细而酥，不像家鸭子肉那么老。汪曾祺介绍说：“野鸭烧咸菜是我们那里的家常菜。里面的咸菜尤其是佐粥的妙品。”

此外，还有冬笋雪里蕻炒鸡丝、蚕豆炒咸菜、咸菜烧豆腐等，都是咸鲜可口的。有了各种搭配，咸菜就不至于单调乏味了。不过，从前的人们过日子，都懂得勤俭节约。汪曾祺小说里的“八十岁”很有钱，可是平时的食谱非常简单。“菜是一成不变的熬青菜，——有时放两块豆腐。初二、十六打牙祭，有一碗肉或一盘咸菜煮小鲫鱼……有鱼时一人一条——咸菜可不少，也够下饭了。”这个人物形象，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比较典型。

汪曾祺对咸菜很有研究，专门写过文章，并且上升到了文化的层面。他认为：“中国不出咸菜的地方大概不多。各地的咸菜各有特点，互不雷同。”但他最爱吃的还是故乡的咸菜。汪曾祺晚年三次回到高邮，有一次是住在亲戚家，当地的一位父母官前来看望，便留下一道吃饭。汪曾祺特地吩咐亲戚做了一盘“大咸菜煮草鱼头子”，这也是他自己十分喜爱的一道家常菜，到了老家更想吃。

在里下河地区，咸菜是人们舌尖上最家常的味道；而对于汪曾祺来说，咸菜留给他的味觉记忆恐怕也是最深刻的。汪曾祺19岁离开高邮辗转漂流，三四年后，在北京，在某个寒冷的冬天，他提笔写道：“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汤。我想念家乡的雪。”

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